

# 第一篇 唯科学主义的根源

## 第一章 现代科学对中国思想的教条影响

就科学的全面应用来说，在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各种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对此，我们可称之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简言之，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在中国，科技的落后更加强了人们对国家富强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国许多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巨大热情时，也就不必惊讶了。

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初影响时期。但直到 1860 年中国才开始采取西方的一些方法。以图存为目的，中国开始以西方为导向学习技术，探求使西方强大的动力。但若认为此时中国人

已完全为现代科学文明的精神和物质所彻底征服，则是错误的。他们对儒学教义框架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的信念几乎没有动摇。张之洞的《劝学篇》是这种情绪的充分体现。可以说他的《劝学篇》对贯穿 19 世纪最后 40 年的改良倾向作了全面的概括。张之洞强调必须坚守中国的经典作为不断灌输精神价值的基础，同时他又祈求输入西学。与中国在 17 世纪对西方科学的反应相比，这是不同的态度。当时耶稣会士在天文学方面的发现，如预测日月食，修改历法等等，都适应并支持了传统意趣，与儒学教义也不矛盾。与 17 世纪对科学的表面理解相比，近代中国接受了作为西方标志的技术，以强兵自卫。张之洞的文章提出要做更多的工业和经济努力，并为学习作为一种使国家物质富裕的手段的科学而辩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自己的这句话浓缩了他的企图及对西学影响的一般反应。

中国与西方科学的接触可追溯到 17 世纪，科学由耶稣会士介绍进来。耶稣会士有关上天的更多知识，使其能渗入到自我孤立的 中国。天文学及对天体现象的预测 诸如日食、月食等 是皇朝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能。通过一小批感到自己传统科学知识不足的官僚学者的帮助，这些教士在中国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与西方科学的第一次接触是成功的，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更深地了解了这些西方发现的本质，而是因为个别的观点适应并支持了传统的意趣，并且与儒学教条也不矛盾，士绅们没有理由担心科学精神的结果将削弱传统信条。但在 18 世纪的后 2/3 时间里，中国再次把大门紧紧关上，现代科学的介绍被推迟到 19 世纪，这时新信仰的主要提供者已是新教士了。

可以说，当试图与西方模式的外部标志相比时，这一时期的狂热行动，是对思维的良好训练，但却未触及灵魂。为促进学习西方

造炮造船的方法,1865年建起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建立了“福州船政局”,同时创办了许多技术训练的专门学校。1862年北京办了一所外语学校,1867年福州办了一所海军学校,1879年天津创办了电信学校。从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到1905年止,翻译出版了大量著作。从这一事实便可看出介绍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辛勤努力。在这一阶段出版了178部著作,其中有66部自然科学著作,38部军事科学著作,35部工程制造著作,11部医学著作,7部农学著作,21部有关历史和制度的著作。但与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对科学的完全制度化和观念化相比,这种对科学进行部分吸取的不足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日本的机械化力量胜过了中国的数量优势,这使许多中国人意识到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更深刻的变革。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第一次感到中国的精神参照框架与现代趋向似乎有些不合适、不合谐。与对过去精神权威信仰的减弱相随而来的是对掌握使西方物质强大的科学精神的渴望。

在介绍西方科学概念、哲学及政治思想方面起作用最大的是严复。他把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斯密的《国富论》、耶芳斯的《逻辑基础课程》等都翻译成中文。早在90年代中期,严复就在天津的一家报纸上写文章,力图确定两种文明的基本不同之处。他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主要不同在于西方文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诚,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sup>①</sup>——“诚”即公正或科学真理;“公”即民主化的平等,它作为西方文明的基础,在20年后被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陈独秀解释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北京 第5页。

为更具体、更富感情色彩的术语。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严格说，严复并不能算是中国新思想的开山，因为他后来从自己在 90 年代的进步思想倒退了，而且一直用文言文来表达新概念。所以，无论是从实际的还是象征的意义，中国是从 20 世纪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教条来接受的。

1898 年的维新运动是对传统框架能否适应现代世界提出疑问的最早端倪。在短期内维新运动似有成功的可能，但仅存在百天后就被嫉妒忌又专制的慈禧太后镇压了。但精神的更深层变化并未减退。大批学生开始到日本、欧洲、美国留学。儒家秩序的支撑点开始削弱，新的国外教育注定要在 20 世纪结果。而且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还面临着由孙中山及其他一些人领导的革命的威胁。

20 世纪前 50 年知识分子的热点是在严重的政治分裂和派系争斗、危及弱小经济的外国干涉、基层的社会动乱，以及被侵略和战争中形成的。这是中国的探索、试验和转变时期。镇压 1898 年维新运动的反对者这时支持迷狂的义和团。由于盲目排外主义（与明确的民族主义相对的迸发使许多外国人、外国货及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最后以使满清王朝威信扫地的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而告终。慈禧太后承认对这次巨大动乱负全部责任，并开始一些改革。但这一努力来得太晚，而本质上又是零敲碎打。1905 年废除科考制度，这样，起码象征性地废除了学者一绅士制度，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社会的稳定力量。这一行动使儒学的中国失去了两大支柱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圣王楷模下的君主专制，它在辛亥革命后也崩溃了）。新措施被介绍进来：1909 年通过了一部宪法；建立了新的教育体系；科学成了学校的一个科目，等等。但这一系列变化仅是为革命者铺平了道路，他们这时的唯一目标就是废除满清统

治和皇权政治。繁忙的革命者无暇思考这种由旧秩序衰亡引起的社会和政治的公开混乱。士绅阶层的废除使农村没有一个主要的安定力量 造成了权力真空 招致种种野心。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再加上一系列革命活动造成的动乱，使地方势力在大半个 19 世纪日渐崛起。

民国刚一成立 便成为野心勃勃精通地方政治的袁世凯的猎获物。袁世凯把虚假的国会政府保留到 1915 年 他在这一年力图重建君主制。1916 年他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最黑暗时期，纷争一直延续到 1927—1928 年国民政府的统一。没有任何一个军阀有独自统一国家的力量，结果就是四分五裂，浩劫不断，国家目标问题的乱糟糟。

甲午战争和《辛丑条约》的耻辱 导致许多人到海外寻求新知识。议会政治在 1911 年后的失败 和 1915 年日本企图控制中国的 21 条要求，都强化了中国社会必须进行更深刻重建的意识。正是在这种焦虑民族危亡的氛围中，作为传统传递者（如果不是制度传递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其精英为士绅——开始强烈呼唤一种新文化。新观念的宣传者中很少有中国的军政首领。他们是一群思想家 没有 有些也不愿 参与到军阀和地方政治中去 他们对此倾向于批判。

对旧秩序的首要攻击是提倡白话文。此时尚为留美学生的胡适提倡用白话文写作。他的提议在国内被热烈接受，陈独秀通过颇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使这一倡议流行起来。就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而言，语言和文学的变革主要地不是技术性的——使中国语言能吸收现代科学术语。它是基于社会考虑的——使口语和书面语言统一 以利大众使用。当新观念通过白话传递到不断增长的读者大众时，这种改革有种破坏性的效果。以

《新青年》为榜样的期刊开始充满书市 借助于这种大众媒介 才可能讨论中国古老文化对西方观念的应用。

胡适对批判态度之普遍适用的辩护，陈独秀要求以科学民主为基础建立现代文明，吴稚晖对科学工业社会的大胆讴歌，都给新世纪的思想家以深刻印象。当蔡元培 1917 年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新思潮在北大聚汇，这所大学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潮流的象征。蔡元培对自由表达的开明要求，使北大荣获新的威望，象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领袖和其他新回国的留学生，都为北大所吸引。更有意义的是，在北大形成了具有共同理想抱负的新一代学生。如果没有这些学生，这次思想运动就不会有现在这样重大的意义。

差不多在 1911 年后的 20 年时间内，中国目睹了政治离心的倾向。如果把日本现代化的成功解释成主要是中央集权的努力，那中国这些年的失败就可以理解了，它缺少这一必要条件。虽然在重工业和高技术化方面还很落后，但中国在民国成立后确实经历了轻工业的增长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相对放松了对中国的注意 给中国以喘息的机会 发展自己的纺织、面粉、火柴、香烟及其它工商业。由于就业机会增大，城市城镇迅速扩大，吸引了许多乡村居民。处于工业压力下的中国家庭体系正在慢慢解体。城市的增长使商人成为重要力量，他们以前主要是在口岸城市从买办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成为“中国的”商人。受西方观念的影响 他们急于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国外学习，虽然受现代观念熏染，但这些商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思考国家独立和统一。商人经常抵制外货，便可说明这种民族主义认同感的觉醒。对 21 条要求的不满使他们在 1915 年导演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学生中注入了一种同命运的牺牲感。

思想家和学生都把威尔逊的 14 点声明作为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信息而接受。但列强却决定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因而，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的凡尔塞条约使人大失所望。1919 年 5 月 4 日由北大学生带头，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这一决议。把范围稍放宽一些，五四运动便成了 1919 年前后中国思潮和行动的象征。作为政治运动，学生的示威阻止了政府在凡尔塞条约上签字。作为文化运动，它有着深远意义，因为学生成了主要思想家提出的各种观念的“应用者”。

1919 年后，学生组成各种都市及全国性团体。他们在业余时间分成小组到农村向大众宣传新思想。正像过去的士绅把儒学道德思想灌输到社会下层一样，学生们对自己新觉醒的传播也没有白费心血。当意识到学生传播的观念与现存的统治和政治哲学完全不同时，他们的作用就更引人注目。从商人支持他们而发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便可看到他们宣传的普及性。

中国人认为凡尔塞和约是民主的失败，这使许多中国人转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解放”启示。1918 年在北大即成立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组。三年后便成立了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20 年代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争夺创建新中国的“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而互相斗争。这一政治问题因 1928 年国民党重新统一国家而暂时解决。整个 20 年代，对民族命运的更多关注是显而易见的。1925 年 5 月 30 日，另一个全国范围的运动发生了。它的抗议对象是久不废除的“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在学生发动下，商人再次行动起来，抵制所有外货。以前从未显示过这种目标与抱负的一致。

1900 年后的 30 年隐含了后来中国发展的大量线索。在头 10 年旧秩序迅速坍塌；在第二个 10 年对新观念应用于中国进行了批

判的讨论在第三个 10 年看到了大众对新文化的运用。30 年代的事件是 20 年代潮流的紧密延续。在这些年代，尽管中国被认为是重新统一了，但实际上许多设想仅被部分实行，因为内有共产主义的压力，外有日本的军事威胁。但国家的真正统一迟迟未能实现，其基本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政府本身未能完全摆脱统一后仍存留的地方主义和传统的政治习惯。而且，30 年代末由于 1937 年中日事件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已在中国开始（称之为“事件”以遵从 1928 年的凯洛格—白里安条约<sup>①</sup>，该条约谴责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战后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使 40 年代后半期既生气勃勃又备受痛苦。

由于儒学为思想和文化提供参考框架的功能衰退，各种思想流派涌入中国，掀起了关于历史、语言、哲学和社会大论战等意识形态冲突。中国思想界对待现代文明的复杂成分的热情和渴望，正像它过去把儒学的价值态度体系和中国人生活中的佛教、道教方面综合起来理解时一样。所有这些计划及其反计划（新思想运动、学生运动、其他种种运动），都自信给自己贴上了完全科学的标签。科学精神取代了儒学精神，科学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哲学。

### 科学的流行

知识分子号召接受科学的世界观 抛弃传统的生活哲学 是从新世纪的头 20 年开始的。胡适概括了科学开始受尊重的特点：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

<sup>①</sup> 即 Kellogg-Briand Pact, 1928 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 (Kellogg) 与法国外长白里安 (Briand) 签订的一项反战条约。——译者注

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张准也谈到了，科学的重要性对知识分子来说正在不断增长。他认为自义和团运动以来，现代学术、科学得到发展，在所有的学校中，科学都成为必修课。留学国外的青年学生注意到科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加注重传播科学。科学的传播成为一种独立的运动。<sup>②</sup> 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实体，被引进取代旧的文化价值。这些人不可能在任何较高的水平上对科学研究或发展一直作出评论 即便在 20 年代，科学研究如果不是在质上，起码也在量上有所不足。

1907 年 7 月，民国成立之前，老练的革命家吴稚晖和李石曾在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它在国外出版 在流亡的中国人和后来回国搞辛亥革命的留学生中拥有广泛的读者。第一期包含的一个信条预示着随后几十年的趋向：

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湃，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3 年版 上 第 2—3 页。

参见张准：《五十年代中国之科学》。《最近之五十年》，上海，1923 年。

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

必须在这种对革命一词的不严格解释中，来纵观近代中国极力发展一种新文学和新世界观的努力。上引摘录便说明，他们轻率地在统治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和被认为是描述了有秩序的，可分析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法（*natural law*）之间划了等号，这使人想起西方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的情形。约从 1914—1915 年开始，中国的革命努力是非常真诚的；它的支持者们既用对革命概念的随机解释，又用“科学的严格性”来武装自己，使他们的事业具有崇高地位。这些努力有许多名称：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用语）以及新思潮等等。一般地说，它们是在这些名称下被研究的，而这一运动的“大众”性质被许多杰出的近代中国研究者承认。虽然士绅制度随着君主制的崩溃而消失，但传统的知识分子精英还存在。他们说话时全国都倾听。“大众”系指那些宣传外国传来的新思想的新一代学生。科学精神渗透所有这些运动。

当胡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号召文学和语言革命时，这份杂志便成为中国意识变化的载体。当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以科学和民主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时，大众立即要求：通过吸收科学的世界观以进行文化改革，通过实行民主进行政治改革。《新青年》为随后的一些出版物定下了基调。1917 年第一次出现的《学艺》在其首页声称以真理为基础促进学术和批判。它成了有影响的宣传唯科学主义的杂志。《新潮》是 1919 年冬由北大的一群学生组织创办的刊物，以傅斯年、顾颉刚、徐彦之等人为首。胡适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它在其前言中说自己的信条是批判精神、科学思想和文学改

《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第 1 期，1907 年 6 月出版。

良。少年中国协会在 1919 年创办了《少年中国》杂志。它也遵循同样的方法，把在科学精神指导下服务于社会以创立少年中国作为自己的宗旨。这份杂志表现了如此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以致这个协会曾一度拒绝任何属于宗教组织的人加入。《新中国》是 1919 年问世的。它致力于传播形形色色的现代思潮，但仍暗含着崇仰科学的强劲潜流。

这类出版物数量极多，有人估计当时在书市能得到的有 400 种。而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为普及科学精神而作的努力最能昭示一种唯科学倾向的兴起。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组织，是由一批在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生于 1914 年发起的，1918 年迁回中国。作为一个研究组织，它的宗旨是为科学增长和工业进步传播科学精神和知识。这个协会的刊物《科学》是以发表一系列有关科学的专业文章为主旨的。但直到 20 年代末，它每期的首篇文章都为采取科学世界观辩护。这些文章后来被汇集成一本论科学的通俗读物《科学总论》由该学会于 1919 年出版。题目都是有代表性的：“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与教育”、“科学与道德”、“科学的人生观”等等。把科学引入生活的各个领域。

这样，此类出版物便成为把科学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的宣传者。而读者多是新一代的大专院校学生，他们感到非学这些观念不可，然后又宣传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仅仅介绍科学世界观已不够了。我们曾说过，唯科学主义是一定要对着不合理的观念和信仰进行批判的。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他们在西方早些时候的同行手中学来的。正如神学世界观和机械世界观的撞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精神震荡一样，中国人现在也开始对宗教问题进行检查。既然借来了科学与民主，那么被借”文化中的宗教是否值得采用，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负责地回答的问题。从 1917 年到 1921 年的讨论，一开

始就是批判性的 而在 1922 年变成对宗教的猛烈攻击。实证主义在这种反宗教运动背后流行起来，必然要排斥多元论哲学。而且在这场运动的背后，物理和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崇高地位使有影响的思想家感到与旧体系联在一起是极不合时宜的。

正当对宗教的进攻还在进行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另一个问题产生了。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次战争是机械论战胜精神价值的后果。科学被认为应对产生这种没有价值观念的机械世界观负责，并被指责为造成了战火的创伤和流血。传统论者认为自己发现了向他们的现代化同胞所宣扬的科学万能论挑战的手段。于是立刻响起一片东方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呐喊。传统论者表达这种情绪时并不孤独，贝特兰·罗素在他 1920—1921 年在中国的巡回演讲中就热情洋溢地盛赞中国的精神文明，并用了些不确定的术语贬低西方的机械论世界观。而被认为是这一时代最多产的报界人士的梁启超，则声称科学的破产，和对中国传统价值的起码是部分的回归，则尤引人注目。

最后，在希求一种新的科学文化的无情压力下，在中国文化与意识的连续性问题上一爆发了一场激烈论争。参加者称之为论战。在许多方面，它确是传统世界观与科学世界观之间的一场战斗。可以说 甚至在 1923 年这场论战开始前 唯科学论者就取得了胜利。我们将在第六章详析这场论战。从反科学论者中有许多知名人士，就可看出唯科学论挑战的严重性了；对中国思想的连续性造成的这种破坏必然被激烈争论。争论围绕几个问题展开，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问题。以张君勱为首的反对派对以科学方法中的物质和原因概念为基础的认识论进行了驳难，而唯科学论者的领头人丁文江则从其作为现象学家的立场进行论辩。争论的一个主要起因（也是一论题）是反对者声称东方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第三个问题

是关于科学能否提供一种生活哲学，这个问题大致表明现代科学显然渗入了中国意识。

在新文化运动的年代里，传统倾向受到威胁，因此价值取向问题便极具重要性。人生哲学的中文表述是“人生观”。一般地说，人生观是个人私事；但在变动时期，传统文化参照系受到实际的威胁，哲学和学术的意义便趋向于更为情感和意识形态的表达。科学世界观的反对者和赞同者都认为人生哲学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反对者极力挽救人生哲学，使其不被科学一元论淹没，而赞同者则认为可以在科学原则、方法和精神上建立一种新的人生观。在 1923 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大多数出色的中国科学家都用一种科学的哲学来捍卫自己的地位。他们得到了吴稚晖、陈独秀和胡适等非科学家的支持。在这次论战中，非科学家的支持给了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以明确的实质意义。

直到 30—40 年代仍能听到这次争论的回声。但科学已不必再为自身而战了；20 年代末及 30—40 年代知识分子的活动则包括其他主题：关于历史、社会及西化模式的争论，所有这些争论在根本上都是用科学的术语展开的。1923 年的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为科学作广告，使唯科学主义这一术语广泛运用于从此开始的实证主义思潮。20 年代的书店里充满了“人生观”一类的书，大多数都企图综合人生和科学这两个概念。各种选集约有 50 到 250 种之多。在对生命的自然、物质方面的“新”观点的压力下，这些著作都着手检查或重新检查诸如生命的起源，人类和宇宙的关系，人类的自然的、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本质，人类的道德、宗教等一系列问题。许多中国思想界领袖都成为科学一元论者。20 年代的这种潮流，导致 30—40 年代更坚定地支持科学的力量，以及认为科学规

律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一致的观点。有两种期刊对科学精神的宣传尤为有力，一是 1932 年南京科学普及会创办的《科学的中国》，另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观和科学方法的《科学论丛》。一方面，二者都表明对科学缺乏真正的理解；另一方面，二者都对科学抱有极高的热情。

在书刊传播唯科学主义的同时，又有几次争论证明中国人的想象力已完全被科学精神所掌握。1928 年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完全是严格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进行的，参战的每一方都尽量表明自己是根据不变的物质力量来解放社会问题的科学家。尽管描述模式不同，但每一方都遵循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行为的理论。马克思提出这种理论仅仅是作为一个分析社会的工具，而他的信奉者（包括中国的）却将其演变成严格的历史决定论。这样，以陶希圣为首的《新生命》和以郭沫若为首的《新思潮》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阵营，发起了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模式来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狂热论战。争论围绕着中国的本质展开。这一论战一直延续到 30 年代，这时，包括李达、艾思奇、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续了唯物的实证主义。例如，毛泽东在 1940 年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对科学作用的理解：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北京，1952 年版，第 679 页。

而国民党的理论家则倾向于一种一般称之为“唯生论”的主张，他们也认为必须用科学的名义，来强调其对柏格森、倭铿生命哲学和王阳明直觉主义的综合，以削减唯物论实证主义的哲学地位和影响程度。孙中山本人早在 1918 年就在其《心理建设论》一书中表达了这种情绪，这部著作在 30 年代蒋介石、陈立夫等的著述中得到回响。二者都感到需要披着科学的外衣而回归儒学的道德。从 1934 年在相当多的地区的居民中开始的新生活运动和许多省级首领的努力和思想中，就可看到这些作者的重大影响了。国民党也被科学所迷惑，正是唯科学主义极端流行和极其有力的象征。当一个以理论和行动一致的论点为基础（这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的思想流派要返回古代道德和直觉主义时，却仍称自己是科学的，正是唯科学论乱贴标签的有趣证明。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种观点之间，30 年代还有另一种唯科学主义。在越来越流行的科学的唯物一元论与披着科学外衣的唯生论之间，经验主义形式的唯科学论最终消失了。但主要由于两大对手之间的权力斗争尚未解决，经验主义在 20—30 年代曾有过一度流行的美好时光。这一派的宗旨是不仅赞同现代化而且赞扬全部西方文明。由于胡适在 1929 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冲突》的文章 鼓吹全盘西化 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西化的争论贯穿了整个 30 年代。争论主要集中于赞成或反对建成一个英美式社会。经验主义信条的提倡者，传统文明的捍卫者，自然选择论者，都卷入了这场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掩盖并最终平息了 30—40 年代的争论。在这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中，经验论者是中立的，但最终却在中国失去势头。当共产党 1949 年取得政权后，国民党伪科学的唯生论也

崩溃了。从前由陈独秀发动的、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一元论的实证唯科学主义潮流，这时随着政治浪潮的变化而凯旋得胜。人类发展规律不可改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似乎得到了实现。

### 唯科学主义的实质和演变

R·G·欧文 R. G. Owen 在他的《唯科学主义 人与宗教》一书中，攻击唯科学主义是一种偶像崇拜，他称之为“科学崇拜”（Scientolatry）。“把科学地位提高的结果”他写道，“在某些方面，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sup>①</sup>他认为：“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它科学地解决，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J·韦莫斯（John Wellmuth）对唯科学主义作了更精致的定义：“‘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sup>②</sup>

这些特征互相补充。前者认为唯科学主义是一种带有取代宗教的感情态度的文化现象。后者则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意识，一种可辨认的哲学，从而也看到了一种精神现象。而我们将试图另给定义，以利于我们的研究。一般地说，唯科学主义是一种从传统与遗产中兴起的信仰形式，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在传统与遗产中得到普遍应用，并成为文化设定及该文化的公理。更严格地说，唯科学主义（形容词是“唯科学的”Scientistic）可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

<sup>①</sup> R·G·欧文：《唯科学主义 人与宗教》费城，1952年英文版第20页。

<sup>②</sup> J·韦莫斯：《唯科学主义的本质与起源》麦韦克，1944年英文版，第1—2页。

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

的确，如果没有科学方法，现代科学将不会是今天这样。J·纳福( John U. Nef ) 指出：“使现代科学与过去的科学区别开来的并非对自然的观察，而是其检查自然的特殊目的和方法。现代科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始终坚持用可控的观察实验作为得到任何结果的前后仲裁，其次在于用数量方法作为达到从属于明确证据的主要手段。’<sup>①</sup>

科学方法是在四个基本原则操作的。首先 对观察、假设、实验、再观察的需要 经验原则。第二 为取得精确的测量必须用数量方法：数量原则。第三，科学方法处理因果关系并常用抽象化来表示这种关系。为此目的，它就必须确定反复出现的行为的意义，然后将其总结成描述并解释这种行为的普遍规律或方程式：科学的机械性原则。第四，是所有科学家的普遍理论，可称之为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探索概念中的固有原则：通过科学而进步的原则。埃德加·兹尔塞( Edgar Zilsel ) 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科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用性上（理论上系指一个科学家做的工作纯然为科学本身；实用性系指一个科学家通过所做工作，把科学进步与文明进步联系起来，意识到通过理论的实际应用给人类带来益处），都被认为是种非个人目的的合作的产物，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科学家都是这合作中的一部分。今天，这种观念或理想几乎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不论是婆罗门教、佛教、穆斯林教或天主教的经院哲学家或是儒家学

J·纳福：《工业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发生》 芝加哥，1953年英文版，第218页。